

1984 年版序言

这是一本综述东周(包括春秋、战国)和秦代考古研究成果的小书。

考古学,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,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,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,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。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种种文化遗存,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,也只有置诸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才能得到认识和理解。因此,怎样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,更好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考古学的丰硕成果,是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。

东周和秦代,在我国绵长的文明史中,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五百多年间,中国的社会经济、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十分剧烈的变革。对当时世变在整个历史发展上的重大影响,汉代以来的学者有过许多议论。近五十年,又有不少关于古史分期的著作,认为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是在东周到秦代这一时期内。有的学者把界线划在春秋、战国之间,有的则划在战国、秦代之间,其论点已为众所周知。

有关东周和秦代的考古材料,数量浩瀚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,考古工作迅速开展,积累了好多新材料,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。现在探索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,必须对大量材料及研究成果有概括的了解。

多年来,在各地文物考古界同志热情帮助下,我有机会观察若干东周至秦代的考古材料。现今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,不过是综合整理材料的初步尝试,包含一些个人的想法和意见。其中少数章节,摘用了我过去所写论文的若干段落。限于学力和识见,不免缺漏谬误,希望

习知,胡服骑射是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特点,平山墓葬群于此却没有什么反映。墓葬中发现的人像,如银首人俑灯^①和许多玉人^②,其服饰都很难说是胡服(当然仍有某些特点)。灯的人形宽衣博裾,完全不是洛阳金村银胡人俑那种打扮。这里观察不出骑射,却有车马坑。青铜器铭文描述战事和狩猎,也都用车,和华夏没有差别。

平山大墓青铜器铭文,反复引用《诗经》,并有同于《左传》、《大戴礼记》的文句^③。其所体现的政治思想,与儒家有密切关联。这种现象,也是中山华化的一个显著方面。

笔者认为,中山的华化和儒学在中山流行,和魏国一度统治该地有关。魏人占领中山,大概有二十多年,起了把华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中山的作用。当时魏君是魏文侯,他师事孔子弟子子夏,使魏国成为儒学的重要中心。魏人李克曾传《诗经》之学,在魏统治中山时任中山相,所以平山铭文反映《诗经》在中山风行,并不是偶然的。

中山覆灭前夕,赵武灵王曾派李疵去观察中山的虚实,他回来报告说,中山王举士朝贤,民务名而战士怯懦,已经露出必亡的预兆。这和平山铭文中体现的尊贤的观点,正相符合。中山该时贵儒学而忽略了武备,恰与赵武灵王的政策相反。华夏的赵国学习胡服骑射而终于吞灭中山,白狄的中山则以举士朝贤而归于衰亡,不能不说是东周历史上饶有意味的事迹。但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,中山的华化应视为各民族文化交会融合的潮流的组成部分,其结果是为列国的统一奠定基础。

1979年,在陕西凤翔县高庄的一座战国晚期秦墓里,发现一件素面的青铜鼎^④,其形制及铭文格式皆与平山1号大墓所出的相同。铭文所记职官人名,和平山1号墓器物铭文直接关联^⑤。这是在平山发掘以外能确定的唯一一件有铭的中山器。在宋、清以来的各种著录里,都没有中山器物,而恰好在平山墓葬群发掘后,就在陕西获得一件,真是难得的巧合。

① 《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》197。

② 《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》194。

③ 李学勤:《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》,《文物》1979年1期。

④ 雍城考古工作队:《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80年9期。

⑤ 李学勤:《秦国文物的新认识》,《文物》1980年9期。

魏地。1929年,山西万泉县东坡村出圆跨布十枚,有“安邑”、“高奴”、“穀”、“阴晋”四种。^①

圆跨布的铸造地,有些只在战国中叶以前为魏所保有。如阴晋,史载公元前332年由魏献给秦,改名宁秦。发掘材料也有一些证据,如陕西华阴岳镇战国前期古城遗址曾出有“朶半斩”圆跨布^②。因此,这种魏布在战国前期便已行用了。

魏圆跨布一般为“半斩”、“一斩”、“二斩”三等,大小重量均有等次。据若干标本测定,一斩在12—13克左右。只有梁圆跨布是两等的,面文有两种(图88),即:



图 88 梁圆跨布

“梁奇斩,百当铢。”(《典》
223)

“梁奇斩,五十当铢。”(《典》
226)
或:

“梁正币,百当铢。”(《典》
218)

“梁半币,二百当铢。”(《典》
221)

据测定,“百当铢”两种重量均相当一斩,所以合计“五十当铢”、“百当铢”和“二百当铢”,实际仍是“半斩”、“一斩”、“二斩”三等。由这种货币推算的“斩”的重量,和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卫国安君鼎计算的数值基本一致。

1929年,河南方城县北山出土“梁奇斩”两等共一百五十余枚^③。辉县固围村第1、2号墓都出“梁正币,百当铢”^④。前人认为这种布为

① 王襄贤:《学术通讯》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》第七集83、84期,1929年。

② 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:《陕西华阴岳镇战国古城勘查记》,《考古》1959年11期。

③ 关百益:《方城币谱》。

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辉县发掘报告》,科学出版社,1956年。

第二十五章 玺 印

中国的古玺印,秦代以前通称为“玺”,秦统一后规定皇帝所用称“玺”,一般只称作“印”。玺印的起源可能很早,于省吾《双剑謠古器物图录》录有铜玺三方,扁平状,鼻钮,有两方与常见商代青铜器铭文相同^①。例如其中一方印面成正方形,边长2.6厘米,通钮高1.5厘米^②,有“亚罗”等字。西周到春秋的古玺,尚无可靠例证发现。今天所说“古玺”,绝大多数均属于战国时期。

收录玺印的印谱,已有久远历史。元人所编《说郛》收有宋王厚之《汉晋印章图谱》,有印九十七方,此书有不少疑点,恐系伪托。现存可信的印谱,以明隆庆五年(公元1571年)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(又名《印薮》)为最早。明清以来玺印收藏家不可胜数,所编古印谱大多是铃本,种数极多,有的只有孤本传世,很难搜集。印谱的专门书目,有王敦化《古铜印谱书目》、太田孝太郎《古铜印谱举隅》和横田实《中国印谱解题》等。^③

对战国古玺的认识,有一个较长的过程。早期古印谱已收入一些古玺,但未能加以识别。乾隆时,著名学者程瑶田的《看篆楼印谱》,序中始提到有“私玺”两字之印。道光时,徐同柏为张廷济编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,举出“古文印”类名,才把古玺区分出来^④。到晚清,开始出现专录古玺的谱录,如吴大澂有《千铎(即“玺”字)斋古铎选》。陈介祺的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及《簠斋手拓古印集》,虽兼收汉以下印,其中古玺已很丰

① 胡厚宣:《殷墟发掘》图版捌拾,学习生活出版社,1955年。

② 台湾故宫、“中央博物院”联合管理处:《故宫铜器图录》下肆玖玖,中华丛书委员会,1958年。

③ 王敦化:《古铜印谱书目》,济南聚文斋书店,1940年,太田孝太郎:《古铜印谱举隅》,1934年;又补遗,1969年。横田实:《中国印谱解题》,二玄社,1976年。

④ 罗福颐:《古玺印概论》第十四章,文物出版社,1981年。

调查发掘,特别是 M6 的材料。M6 为“中”字形大墓,推测为中山成公所葬。至于城外的 M1 王𡈼墓的发掘报告,也已于 1996 年印行。^①

燕下都故城,也有了系统的综合报告^②。因燕下都遗址的发现早,考古工作时间长,报告的内容自然特别丰富。

有关燕国历史的文献比较难于查检,现有陈平《燕史编年会按》一书^③,做了全面整理;古文字方面,则有冯胜君《战国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》^④,对研究有很大裨益。

清代中叶出现的一对齐侯壶,或称洹子孟姜壶,前人多以为春秋晚期物,认为“洹子”是陈桓子。最近从器物型式分析,壶只能属春秋早期。^⑤

1990 年,于齐故城以南的“田齐王陵”附近发掘了 4 座战国大型墓葬。最重要的一座“甲”字形墓编号为淄河店 2 号墓,规模较大,现存墓口南北长 16.5 米、东西宽 16.3 米^⑥。墓内有车 22 辆,墓北侧马坑有马 69 匹。一椁二棺,椁室后部殉 12 人,骨架保存较好的鉴定都是年轻女子。随葬器物有陶质的 7 鼎 6 簋及编钟、编磬等等。这座墓属战国早期,墓主据戈上铭文是国楚,当为姜齐贵族国氏中人。

在淄河店西北的商王村,1992 年至 1993 年发掘了 4 座“战国晚期”墓^⑦,也有珍贵文物出土。但仔细考察,其 M1、M2 很有可能晚到汉初。2004 年冬,山东青州西辛也发掘了一座“中”字形的“战国晚期”大墓^⑧,墓室南北长 27.8 米、东西宽 25.3 米,加上墓道全长达到 100 米左右。墓中设有石椁,其内才是木质棺椁,在南墓道北端、二层台上和木椁东侧,有陪葬坑或器物箱,出土陶器、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玉器等

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:《𡈼墓——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》,文物出版社,1996 年。

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:《燕下都》,文物出版社,1996 年。

③ 陈平:《燕史编年会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 年。

④ 冯胜君:《战国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》,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1997 年。

⑤ 李学勤:《齐侯壶的年代与史事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6 年第 2 期。

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2000 年第 10 期。

⑦ 淄博市博物馆、齐故城博物馆:《临淄商王墓地》,齐鲁书社,1997 年。

⑧ 国家文物局:《200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》,第 75—79 页,文物出版社,2005 年。

演进提供了标尺,有其特殊价值。

又有若干楚国大墓经过发掘,如 1994 年的河南新蔡葛陵楚墓^①,2000 年的湖北荆州天星观 2 号墓^②,2002 年至 2003 年的湖北枣阳九连墩 1、2 号墓^③,均出有大量富于学术与艺术价值的文物。

河南淅川丹江流域的楚墓,自 1978 年下寺 1、2、3 号墓的发掘有重要发现而受到关注。此后陆续有所发现,1990 年至 1991 年,于和尚岭、徐家岭做了发掘^④。直到最近,徐家岭还有新讯息传来,M11“甲”字形大墓是 2006 年南水北调工程中发现的最重要墓葬^⑤。当地是楚国蒧氏等贵族的墓地,对探讨楚文化有较大意义。

应国墓地的的工作又有不小进展^⑥。一部分青铜器不幸流散,有些为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,但大都是西周的。南阳市博物馆旧藏一件鼎盖,作器者为“应侯之孙丁儿”^⑦,年代系春秋晚期。丁儿是应君后裔,并不意味应国那时仍然存在。

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4 月,在湖北枣阳郭家庙发掘了一处曾(随)国墓地^⑧,共清理发掘墓葬 25 座、车马坑 1 座、车坑 2 座,属于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。引人注目的是,墓地中 GM21 曾伯随墓最早,器物“文化面貌几乎与正统的中原周文化无异;越晚与中原周文化距离越大,越接近汉淮方国和楚文化”,这反映了楚文化向这一区域推进的过程。到了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,实质上已融入楚文化的范围了^⑨。

2002 年,在河南叶县城南澧河南岸的故城之东,抢救发掘了一座大墓,虽经盗掘,仍出有大量文物,包括青铜器 304 件。其中戈上有铭文“许公宁之用戈”,可知墓主为公元前 592 年即位,前 576 年迁都到

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新蔡葛陵楚墓》,大象出版社,2003 年。

②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:《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,2003 年。

③ 国家文物局:《2002 中国重要发现》,第 52—56 页,文物出版社,2003 年。

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淅川县博物馆:《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》,大象出版社,2004 年。

⑤ 《河南淅川发掘有意外收获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07 年 3 月 16 日。

⑥ 杜淑荣主编:《河南省^①顶山应国墓地史料选编》,平顶山市档案馆。

⑦ 尹俊敏、刘富亭:《南阳市博物馆藏两周铭文铜器介绍》,《中原文物》1992 年第 2 期。

⑧ 襄樊市考古队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队:《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,2005 年。

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曾国青铜器》,文物出版社,2007 年。

叶,前 547 年卒的许灵公。最近墓中一件青铜饰件经科学鉴定,证明是失蜡法铸件^①。

土墩墓的研究正向纵深发展,有专著作了综合与分期^②,这对于认识与之有关的若干文物的时代有很大帮助。

徐国历史也有学者专注^③。近几年一个很有兴趣的探索课题,是徐和越的关系。1982 年,浙江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两件徐国青铜器,90 年代绍兴又有两件铭文与徐有关的越戈出现^④,看来两国之间的史事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内涵。

专门辑录吴、越、徐等国青铜器铭文,有董楚平先生《吴越徐舒金文集释》^⑤。研究这一地区青铜器,还可看《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》、《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》等书。^⑥

关于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有新的探索。2000 年,于江苏苏州灵岩山侧木渎盆地发现面积很大的当时城址,有城墙残存,城内有类似夯土台基的土墩^⑦,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工作。

1992 年至 1994 年,苏州浒墅关真山墓地进行了两次发掘^⑧。墓地共有土墩 57 座,大多数为一墩一墓,年代自春秋下至战国晚期。其中位于大真山顶的 D9M1,现存封土台顶部东西长 26 米,南北宽 7 米,底部东西长 70 米,南北宽 32 米,自底至顶高 8.3 米,规模宏大。土墩由内、外封土构成,并有加固用的石墙。墓室系在山体基岩上凿出,呈长方形,东西长 13.8 米,南北最宽 8 米,墓底最深 1.8 米,有一条墓道石砌棺床上棺槨已朽,共有七棺二槨。随葬器物大部被早期盗掘扰乱,但

①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、叶县文化局:《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7 年第 9 期。李元芝、张方涛、谭德睿、华觉明、张明悟:《许公宁透空蟠虺纹青铜饰件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7 年第 1 期。

② 杨楠:《江南土墩遗存研究》,民族出版社,1998 年。

③ 徐永生:《徐国史研究》,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 年。

④ 曹锦炎:《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》,《文物》1984 年第 1 期;《越王得居戈考释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25 辑,2004 年。

⑤ 董楚平:《吴越徐舒金文集释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2 年。

⑥ 马承源主编:《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》,香港两木出版社,1997 年。

肖梦龙、刘伟主编:《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》,科学出版社,2004 年。

⑦ 张照根:《苏州春秋大型城址的调查与发掘》,《无锡文博》2003 年第 2 期。

⑧ 苏州博物馆:《真山东周墓地》,文物出版社,1999 年。